

## 再答刘崇顺同志

张 琢

刘崇顺同志新赐大作《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关于张琢同志〈答刘崇顺同志〉的答辩(九死一生)理论再探》已拜读(见前文,以下简称《再探》)。

我认同崇顺同志所说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并感谢崇顺同志的盛情和厚爱。

同时,既然《再探》说,我们在对历史唯心论和机械决定论的态度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我更赞成不再在这些“历史唯物论的常识”问题上“饶舌”。

《再探》把我的观点“浓缩”为这样一个“命题”：“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限界定在宋元之际未必不可以。”我觉得还须再说明两句才更准确。《九死一生》第二章第三节关于这个问题的内容主要是两点：一是宋代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二是宋元之际(尤其元初北方)资本主义因素的被挫折(第65—75页)如果以“未必不可以”来概括我对“宋代资本主义因素萌芽”说或“宋代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看法,我都认同。不过,我要重申,“资本主义因素”、“资本主义因素萌芽”这些概念和宋代资本主义萌芽说,首先都不是我提出来的,发明权都不在我,不能掠人之美。它们已有了少则十多年,多则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早都是用惯了的学术术语了。但《再探》说我“是先做结论,再寻求论证”,则不能接受。前人对这些问题历久的探索研究成果,已可谓浩帙叠卷,我虽未能穷尽,但主要的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著作我是先学习了的。拙著《九死一生》第二章也专门梳理了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各个时期的几种资本主义萌芽说。其中包括比宋代萌芽说更早的战国时代中国已进入商业资本主义说和汉代萌芽说的代表性观点,并从事实上和方法论上,对这两种观点作了否定(见第41—60页),亦可见,并非如《再探》所指责的那样“一味沉溺于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机遇丧失的痛失之情,……总是希望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或中国现代化的肇始时间上溯得更早一些。”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的讨论,就我自己的认识过程而言,最初是在50年代上大学时开始注意到的,直到80年代中期,我接受的还是看得最多的明代萌芽说,不过,只存在脑子里,并未形诸笔墨。自80年代中期,在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时,回溯前现代化时期的社会发展历史时,有机会看了更多的著作,其中最多的还是持明清萌芽说。同时,国内外关于宋史的研究有了深广的开拓,很受启发,才渐渐使我在深化对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的基础上,进而感到说宋代已出现了新的经济因素(漆侠)或资本主义萌芽(傅筑夫等)也不无道理。并在《九死一生》辟专节(第65—73页)介绍了宋代经济史专家漆侠教授等有关的研究成果。因此,《再探》说我是“先作结论,再寻论证”是不符合事实的。

《再探》说“傅筑夫先生断言‘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结构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因素’,我们并不感到什么不妥。但是,‘资本主义萌芽’就不同了,它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出现、开始形成,或者初具雏形,它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即将出现。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萌芽’只可能出现在封建社会末期,而不可能出现在它的早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同意轻易上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限。”并认为“傅筑夫先生的概念界定是很清楚的,也是严谨的。”这里我们且不去

扩大到又一个需要更多篇幅讨论的关于社会形态划分的理论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具体分期问题。幸而,至少到现在,我们还未看到有人把宋代划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我们即以《再探》所称道的治学“严谨的”傅筑夫先生的研究看,正是他根据其掌握的资料,运用他的“资本主义因素”、“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和“资本主义萌芽”等概念体系,“很清楚”地得出了“宋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产生时期”的结论,他的《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第二节的标题就是《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该文还认为唐代“经济结构的胎内孕育着资本主义因素的最初萌芽。”而宋代的资本主义萌芽“所达到的水平,超过十四、十五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sup>①</sup>为什么我一沿用“资本主义因素”,“那就很别扭了”,我一赞同宋代萌芽说,就是“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了呢?

说到这里,我还想顺便交待一下《九死一生》这个书名的由来。该书为我们“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研究”课题组完成的三本成果之一,另两本是《国外发展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和《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马克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三本书在学术结构上互相补充。三本书都是在1991年完成,1992年先后出版的。《九死一生》书稿原名为《中国现代化研究》(见《国外发展理论研究·序》)但拿到出版社出版时,责任编辑希望能改一个更吸引读者的题目,以提高发行量。我自己也感到,原题目与既有的一些关于中国现代化史的书名有些雷同,才与责任编辑商量改成了现在这个书名。所以也并非先定下《九死一生》这么个题目,再按这个“立论要求”,去“制约”具体的“命题”。相反,我是从收集前人积累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入手,再加以梳理、归纳和分析,一个一个专题研究发表后再串起来成书的。这本书从总体上看,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且相对于所描述的对象的时间和空间跨度看,是极其简单的,理论分析和概括还谈不上——这是我现在正在努力进行探索的课题,希望有生之年能写出来就教于方家。所以,就我自己对已出版的这本来看,还谈不上什么“理论”,崇顺把它名之为《九死一生》理论,我实在还不敢当,现在只好权且作为友人对我的一种鞭策暂留一个空名,待来日再逐步去填补吧。这也算是对崇顺同志的一个答复,同时顺便借此敬告还在寻问着那本《中国现代化研究》的热心读者:《九死一生》就是它。

末了,我还是诚恳希望我们冷静地坐下来,先认真地多读点书,再作道理,以免贻笑大方,同时可省出宝贵的篇幅于识者。否则,我们真要“沉溺”于非理性的泥坑里爬不出来了,就此打住吧。

责任编辑:王 颀

<sup>①</sup>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669—708页。